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与发展

王紫静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9日

摘要

本文立足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自然力与生产力关系的基本立场, 从理论溯源、内涵阐释与发展创新三方面展开论述, 系统揭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本质, 并从生态价值观、科技观和历史观三个维度阐释其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化创新。研究认为, 新质生产力将生态环境从“外部约束”转化为“内在规定”, 实现了生态观的时代化发展。通过与国际上“生态现代化”等理论比较, 以及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具体案例分析, 本文论证了这一绿色生产力范式深植于唯物史观, 回应了工业文明下的生态悖论, 顺应了从工业文明向可持续文明的演进趋势, 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完善的协同为价值旨归,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实践层面, 需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先导, 健全绿色制度与治理机制, 强化绿色科技创新驱动, 为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绿色生产力, 生态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Zijing Wang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August 28,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9, 2026

Abstract

Grounded in Marx's fundamental posi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between natural forces and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green esse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theoretical tracing, connot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al

文章引用: 王紫静.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与发展[J]. 哲学进展, 2026, 15(9): 280-287.

DOI: 10.12677/acpp.2026.159449

innovation. It further elucidates its contemporary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ecology from three dimensions: ecological values, ecological view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ransform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an “external constraint” into an “internal imperative”, thereby achieving a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hought. By comparing with international theories such a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conducting a specific case analysis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paradigm is deeply root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responds to the ecological paradox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conforms to the evolutionary trend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sustainable civilization. It takes the unity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as well as the synergy between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improvement,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 guide, improve green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gree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arxist Ecology, Green Productive Force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高质量发展的进程必须以生态可持续为基本底色，生产力的跃升必然同步表现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环境影响的降低。基于这一认识，相关重要论述既揭示了新质生产力所内蕴的生态属性，也提出了一个具有理论深度的命题——新质生产力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

当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多聚焦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而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展开的系统性理论阐释仍相对不足。为了提升论证的深度与广度，本文将首先进行国际理论比较，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向度置于“生态现代化”、“绿色生产力”等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加以审视；随后，通过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案例分析，将理论探讨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实践中，以期丰富新质生产力理论提供生态维度的解读与补充。

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基础

2.1. 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辩证立场

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自然界被视作具备“优先性与本原性”，是一切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赖以生成的“第一源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提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这一经典论述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内在的、不可割裂的有机联系。劳动构成“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借助自身活动去“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基本方式。作为对象化的实践形式，劳动不仅塑造外部自然，也不断重塑人本身，其实践品格直接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程度。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亦着重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2]实践因此成为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性根基与核心逻辑线索，内在地规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根本性变革。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劳动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人类借此与自然界进行持续的物质交换，这一过程既改变自然面貌，也不断促成人类自身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承续上述核心立场的基础上，依托“新陈代谢”理论的深化，为当代生态问题的剖析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系统阐释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城乡分离与长距离贸易的扩张——严重干扰了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的物质循环体系，导致诸如土壤肥力耗竭、森林资源衰减等生态灾难的频发[3]。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反生态逻辑的深刻批判，客观上催生了新的生产力变革诉求，即要求在生产系统中嵌入生态原则，推动从征服性开发向共生性协调的模式转换。

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深刻的辩证互动关系——保护生态不仅不是对发展的束缚，反而是生产力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改善生态本身就是发展质量的跃升。这一关系从理论上为绿色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学理基础。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正是根植于对上述“新陈代谢断裂”现象的反思与回应，旨在将生态考量系统性地融入生产力结构，推动生产方式实现质的变革。这一理论层面的根本性重构，集中体现为绿色生产力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概念的三个显著突破：其一，在要素体系上，绿色生产力将自然资本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从原有外部条件转化为内在构成要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其二，在运行方式上，它要求生产活动严格遵循生态循环的内在逻辑，推动废弃物的资源转化和减量化处理，从而有效弥补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循环的中断；其三，在目标取向上，它将生态效益提升至与经济收益并列的关键位置，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2.2. 自然力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强调，“自然力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源性物质条件”。自然力能否可持续利用，直接关系到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实际能力，由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三者构成。自然界提供了最初的生产力要素——不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来源于自然界，劳动者也首先是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而存在和活动[4]。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涵盖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内蕴着丰富的绿色意涵。

这种辩证统一关系首先体现在自然力构成生产力的物质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自然力区分为两类：一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土地、水、风、阳光等；二是“人的自然力”，即劳动者自身的体力和智力。前者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后者作为生产的主观条件，二者在劳动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离开了自然力的支撑，社会生产力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5]。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6]。更为关键的是，自然力与生产力之间不是单向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与制约关系。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也受制于自然规律的客观约束。当人类活动遵循自然法则时，自然力得以持续再生，生产力获得持久动力；反之，当人类过度索取或破坏自然时，自然力便出现衰退乃至枯竭，生产力发展也随之陷入困境。马克思所揭示的“新陈代谢断裂”正是对这种失衡状态的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割裂了城乡之间的物质循环，导致土壤自然力的耗竭，最终反过来削弱了农业生产力的根基。

因此，自然力与生产力辩证统一的根本要义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应以自然力的可持续再生产为前提，而非以牺牲自然力为代价。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正是对这一辩证规律的自觉回应。它要求在经济活动中

将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纳入生产力评价体系,实现自然力向社会生产力的良性转化,以及社会生产力对自然力的积极反哺。唯有如此,生产力才能摆脱对自然力的“消耗型”依赖,走向“滋养型”共生,最终实现马克思所期许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

2.3.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悖论的批判

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生态悖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的劳动既与自身相异化,也与作为其存在基础的自然相异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由此遭到系统性割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理性的宰治”下,将自然视为可以无限索取的免费财富,唯一的目标便是利润的最大化与资本的自我增殖,而对自然进行超负荷消耗和巨大破坏。这种以“消耗型”为主导的生产逻辑,一方面造成了资源衰竭、环境污染等显性的生态危机,另一方面则在深层结构上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使发展本身走向了自我否定的歧途[7]。马克思由此阐明了生产力生态化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认为生产力的真正解放,不能依靠对自然力的掠夺式利用,而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物质循环的基础之上,使劳动过程同时成为修复自然、滋养自然的过程。这一批判不仅为反思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提供了锐利武器,也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向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绿色低碳为基本底色,其本质恰恰是对资本逻辑下“毁灭性发展”的超越,是在更高水平上复归马克思所期许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唯有如此,生产力才能摆脱对自然力的“消耗型”依赖,转向“滋养型”共生,真正实现生产方式与自然循环的内在统一,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3. 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

3.1. 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要素构成

新质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构成,并非在传统生产力要素之上简单叠加“绿色”标签,而是从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者的内在关系出发,实现生态维度的系统性重构。首先,就劳动者而言,生态内涵的注入意味着劳动者不仅需要掌握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劳动技能,更必须确立起自觉的生态意识,将自然规律的内在要求内化为生产活动的基本准则,从而由“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自然的守护者”。其次,就劳动资料而言,生产工具与工艺设备的革新不再以单纯提升效率为唯一目标,而是将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生态功能嵌入技术设计的全过程,使劳动资料本身成为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负荷的载体。再次,就劳动对象而言,新质生产力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与利用方式,一方面通过循环技术使废弃物重新进入生产流程,另一方面借助生物合成、新材料研发等手段开辟可再生、可降解的新型劳动对象,从而在源头上缓解对原生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更为关键的是,这三个要素并非各自独立发挥作用,而是通过优化组合与协同联动,形成“劳动者自觉-劳动资料绿色化-劳动对象循环化”的有机整体,使生产力系统整体呈现出低熵运行、高效利用与持续再生的生态属性[8]。正是这种要素层面由内而外的生态化重构,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深层根基,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3.2. 新质生产力绿色属性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内在地发展和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因而具有深刻的绿色底蕴与鲜明的生态品格。从理论渊源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生态思想,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的内在要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用有节”等生态哲理,则为新质生产力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二者的有机结合,使新

质生产力在生成之初便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融入生产力的各构成要素之中，使社会生产力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实现向自然力的合理复归。这种复归并非简单的历史回退，而是在充分掌握自然规律、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基础上，使人的生产活动与自然循环系统重新达成有机的统一。由此可见，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底色，它并非外在强加的规制或道德诉求，而是内化于本质、贯穿运行全过程的底层逻辑。正是这种由内而外的绿色属性，使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增长模式，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先进生产力形态。

4.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发展

4.1. 生态价值观的创新：从“征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传统生产力观深深植根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土壤，将自然视作客观被动的对象，突出人对自然的单向占有与技术性征服，却严重遮蔽了自然作为生命母体对人类生产活动的根本性制约。在这种视域下，生态环境被视为外在于经济系统的“成本项”或“天花板”，发展越深入，生态越紧张，人与自然的张力不断累积，形成一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

新质生产力理论则实现了根本性的价值翻转，它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主奴隐喻”中解放出来，明确将共生性、互惠性作为生产力跃升的本体论前提。它不再仅仅追问“自然能为我生产什么”，而是深刻反思“自然何以支撑可持续的生产”。在这一框架中，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不再是对发展的妥协性约束，而是生产力质量本身的内在标尺——生态环境由此从“外部约束”升华为“内在规定”，成为衡量生产力先进程度的核心维度之一。

这一转变内含对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统一性的科学确认：健康的自然系统本身就是最基础的生产力要素，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又必须以自然系统的再生能力为边界条件。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而是相互赋能、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由此，传统的“保护”与“发展”之间的零和思维被打破，代之以动态平衡的辩证逻辑。这一认识跃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大深化；即从“人化自然”走向“生命自然”。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具有自身价值、运行规律和生命韧性的共同体成员；它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源泉，也是生产力持续性的生态底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从单向支配转向双向滋养，从征服逻辑转向共生逻辑，最终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深层价值根基与持久伦理动能，也为重新理解生产力范畴本身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唯物史观视域。

4.2. 生态科技观的拓展：从“工具理性”到“绿色科技伦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这一论断揭示了科技在生产力跃升中的核心驱动作用。然而，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科技创新往往被窄化为纯粹的效率工具，服务于资本增值与产出最大化的单一目标，技术理性日渐膨胀为“工具理性”，自然界的复杂性、有限性与内在价值则在计算逻辑中被系统性地忽略。这种单向度的科技观，虽然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却也埋下了生态失衡、资源耗竭与代际正义受损的深层隐患。

新质生产力理论则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科技价值坐标的根本性重构。将科技创新从“效率至上”的单轨逻辑，拓展为“绿色低碳”引领的多维价值体系。新一轮科技革命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新材料等为先锋，带动几乎所有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9]。其中，生态化已不再是科技发展的外部附加要求，而是深度嵌入科技范式本身的核心创新维度：清洁能源技术、循环制造工艺、数字化碳管理、生态传感监测等，无不体现出科技与自然规律的和解而非对抗。

由此，“科技是生产力”这一经典命题被赋予了全新的生态维度：科技是否先进，不仅要看其劳动

效率的提升能力，更要看其单位生态足迹的降低能力、资源闭环的构建能力以及对生态系统韧性的维护能力。新质生产力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动力支撑，将伦理约束前置化为技术研发的基因编码，使科技从“征服自然的利器”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合力”。这一转变标志着生态科技观的深刻升华，从工具理性走向绿色科技伦理，本质上是将责任逻辑、代际正义与生态系统整体性纳入科技发展的价值内核，使科技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成为修复人与自然关系、构建生命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4.3. 生态历史观的深化：从“黑色生产力”到“绿色生产力”的跃迁

从唯物史观的宏大视野审视，生产力的发展从来不是纯粹的技术演进，而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时代映照。传统工业化道路所催生的生产力，在本质上可称之为“黑色生产力”。它以化石燃料的大规模消耗为基础，以线性经济“开采-生产-消费-废弃”为运行逻辑，在创造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系统的严重透支与气候系统的持续失稳。这种生产力模式虽然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与进步意义，但其深层矛盾在于，它将自然视作取之不尽的“原料库”和纳之不竭的“排污池”，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制造了日益尖锐的物质变换断裂。

新质生产力则实现了历史性的范式转换，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生产力”。它不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简单修补或边际改良，而是对生产力质态的重新定义。它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代际公平，内化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内在品质。劳动者具备生态素养与绿色技能，劳动资料转向清洁化、智能化装备体系，劳动对象从原生资源拓展至再生资源与数据等新型绿色要素。由此，社会生产力在更高的历史阶梯上实现了向“自然力”的辩证复归。这不是退回前工业时代的被动依赖，而是在充分掌握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使人类生产活动重新嵌入地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可持续边界之内，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稳步迈向可持续文明。

这一跃迁的深层意义，在于生产力评价尺度的根本性重构。传统的生产力衡量标准高度聚焦于GDP增长率、产出总量和劳动生产率等经济指标，却将生态损耗与环境成本排除在核算框架之外，造成了“增长越快，负债越深”的发展悖论。新质生产力则推动评价尺度从单一的“GDP增长”转向综合的“人与自然和谐程度”，将碳汇能力、生物多样性指数、生态服务价值、环境质量改善等纳入发展绩效的考量体系。这一转变意味着生态文明不再是悬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道德呼吁，而是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根基。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从外在平衡走向内在统一，从增长逻辑走向发展伦理，最终为人类文明的永续演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前提与制度方向。

4.4. 生态观的时代化跃升：从“外部约束”走向“内在规定”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核心关切，始终在于如何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尽管被纳入政策议程与法律框架，但其本质仍被定位为外在于经济系统的“约束条件”——发展需以“不突破生态红线”为边界，保护被视为对增长的“让渡”与“妥协”。这种“外部约束”式思维，即便设置了越来越高的环境门槛，依然未能摆脱“先发展后治理”的线性逻辑，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在制度表层得到缓冲，却在发展深层持续累积^[10]。

新质生产力理论则推动生态观实现了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范式跃升：生态环境不再仅仅是外在于发展过程的制约性边界，而是内化为生产力质量本身的规定性要素。这一跃升的哲学根基在于，新质生产力重新定义了“生产力”的存在论前提——它不再将自然视为外在于人的纯粹物质资源，而是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与持续性视为生产力得以生成与维系的本体论条件。自然不再是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是生产力的“内在构成”；生态健康不再是发展的“附加成本”，而是发展的“先决资本”。

这一从“外部约束”到“内在规定”的转化，在实践层面体现为三重深刻变革。其一，评价尺度的内

在化：生态环境质量不再作为独立于经济绩效之外的“环保指标”而存在，而是深度嵌入生产力评价的全要素体系之中。单位产出的生态足迹、资源利用效率、碳汇能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有量等，成为衡量生产力先进程度的内在参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由此从“两张皮”走向“一体化”。其二，生产函数的内生化：在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框架中，自然资本不再被排除在生产函数之外，而是作为与劳动、技术、数据并列的核心生产要素进入经济核算与决策模型。生态修复、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不再是生产活动结束后的“补救措施”，而是从技术路线选择、工艺设计到供应链管理的全流程内嵌逻辑。其三，制度安排的制度化：生态环境从“政府监管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市场主体自觉遵循的内在规范，绿色金融、碳交易市场、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使生态价值的实现不再依赖单一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市场机制与产权安排内化为经济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函数，形成“保护即发展、发展即保护”的自洽闭环。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跃迁的深层理论贡献在于，它突破了经典著作中侧重于“批判性揭示”的理论范式——即主要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掠夺性逻辑——而转向了“建设性重构”的新境界。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类史与自然史的相互制约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以对抗形式表现出来；而新质生产力所推动的生态观时代化，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对这一矛盾的积极扬弃与制度化化解。它证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必永恒地陷于“增长-约束”的零和博弈，而可以通过生产力质态的变革，实现发展逻辑与生态逻辑的辩证统一[11]。

由此，生态环境从“发展的天花板”升华为“发展的承重墙”，从“不得不守的底线”转化为“值得追求的高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获得了全新的时代内涵：不是外在强制下的和谐，而是内在规定中的共生。这一跃升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深化，更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唯物史观升华——它确认了生态文明不是工业文明的简单否定，而是生产力在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内在觉醒与自我超越。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奥秘，正在于此：当生态环境成为生产力的内在规定，绿色便不再是发展的约束色，而成为发展的底色、本色与亮色。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当代的发展，集中体现为对生产力本质的重新定义：生态维度已从过去被视为外部的、附加的约束条件，升华为生产力内在的品质规定。这一认识跃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新时代实现了质的飞跃。

在理论层面，这一生产力范式的革新，从生态价值观的根本转向、生态科技观的伦理拓展、生态历史观的范式跃迁三个维度，系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化升华。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生态现代化”“绿色生产力”等理论的系统比较，可以清晰地看到，将生态作为“内在规定”的理论模式在逻辑起点和实践旨归上均具有显著的独特性与创新性。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为案例，既能透视绿色生产力在实际发展中面临的真实矛盾，也能观察到其通过制度创新寻求解决路径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将“内在规定”拆解为技术、组织和制度三个层次，则有助于澄清这一核心概念的具体形成机理。

这种新的生产力观，摒弃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传统认知，将和谐共生确立为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它突破了科技仅服务于效率提升的工具理性桎梏，赋予科技创新以明确的绿色伦理导向；它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揭示了生产力发展必须尊重自然规律的内在要求，推动生产力回归生态文明的运行轨道。在实践层面，这一理念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坚实的生产力根基。它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动力支撑，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路径依托，将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发展优势，使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从外在协调走向内在统一，从政策倡导转化为制度性实践。

由此，这一理论探索不仅从学理层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内涵，更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中，以其鲜明的生态底色标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的全新高度，为人类文明向可持续文明的历史性转型

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和坚实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2]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 席景. 福斯特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解读及其启示[J]. 哲学进展, 2022, 11(4): 806-812.
- [4] 佟明燕.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向度及其当代启示[J].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1(2): 8-12.
- [5]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6]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57.
- [7] 韩升, 王雪钰.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哲学意涵[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3-27(2861).
- [8] 张志朋, 李丽利. 新质生产力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探赜——基于生产力实体性要素视角[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25(3): 24-30.
- [9] 任福兵, 孔德进. 新质生产力生态向度的核心意蕴与实践进路[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7(6): 581-590.
- [10] 沈广明.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叙事[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11): 67-74.
- [11] 江沙.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三维探析[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7(2): 23-33.